

“高仿”假冒真品：收藏市场的“毒丸”

本报记者 屈 茜

说起从拍卖行买回“印刷赝品”的经历,在收藏圈里摸爬滚打近20年的郝惊雷既气愤又悔恨。

“这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郝惊雷说,2010年5月,他在嘉德春拍上看中了王文治行书手卷、方士庶沧海秋波图和顾文渊、蔡远等合作的山水画册,经过竞拍,他以20万元的价格中标。“中午取回拍品,在自然光下打开一看,发现情况不大对。”

郝惊雷立刻折回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要求退画,但拍卖公司否认了是印刷品的可能。接着,郝惊雷将3幅字画送到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进行鉴定,3位分别来自故宫和荣宝斋的专家给出结论:王文治行书手卷与方士庶沧海秋波图并非真迹,顾文渊、蔡远等合作的山水画册结果待定。随后,他又请印刷界的专家进行鉴定,得到的答案是3幅均为印刷品。

“如果是后人仿制的赝品,我也就认了,但这是印刷品,严格地说是工业产品,没有丝毫收藏价值。”郝惊雷说。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他将嘉德公司告上了法庭。

2010年9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嘉德公司否认3幅字画是印刷品,并表示“不保真”是拍卖行业的规则。在双方对鉴定结果存在分歧的情况下,郝惊雷向法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

“自从这起案件被媒体曝光后,很多有相同遭遇的收藏家或明或暗地对我表示支持。”郝惊雷说,他逐渐明白,“这起案子掀开的仅仅是书画复制的冰山一角”。

以假乱真的印刷书画

郝惊雷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据业内人士介绍,国内高仿印刷书画的印制、销售、拍卖已经形成了产业链条,并流入了艺术品交易市场。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尹毅较早就开始关注书画印刷。“上世纪80年代,我参与过书画的印刷复制。当时,某美术机构经过黄胄先生的同意,对他的一幅作品进行了复制。”尹毅说,那时的印刷作品会留有网点,如同“胎记”,是复制品与手绘作品的主要区别。

“当时有年轻的技术员提出,能否把网点去掉,以最大限度追求与原作的相似度,但立刻被在场的印刷专家否掉。专家认为这项技术不可能实现。”尹毅回忆说。进入新世纪后,国外喷墨打印技术引入国内,复制行业得到



左图为正在打印中的高仿书画,该机器可以同时打印四张书画作品。右上图为某作品印章40倍放大图,右下图为某作品复制品印章40倍放大图。可以看出,复制品的放大图中充满了微喷色点。

了很大发展。“2006年,我看到了无网点的书画印刷品,非常惊讶,那个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的技术实现了。”尹毅说,随后他开始研究这一课题。据他观察,2009年至今是书画印刷复制发展最快的两年。这两年里,喷墨印刷技术的普及可谓神速,仅北京开展这项业务的公司就多达百家。

“国外几项印刷技术的发明也为中国书画的印刷复制提供了可能。”从事印刷多年的林治洪表示,3年前,美国惠普公司研制了颜料喷墨印刷设备,有别于以往的染料墨,其与手绘书画所用颜料更为相似,而且可以直接印刷在无涂层的普通宣纸上,这使得材质与真作更为接近。此外,微喷技术的实现使得墨点接近无限细小,加上墨滴在宣纸上的晕染,印刷作品上的墨点很难被观察出来。“专门的制假机构还会选择使用印版印刷。他们通过激光制版,再利用相关技术消除网点,使检测方法抓不到把柄。”林治洪说。

“对于书画印刷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打印机和打印软件。一台打印机的成本四五万元,打印软件仅需千元,投资门槛很低。”林治洪说,国内书画印刷公司多数处于中低水平,其成品散布在类似北京潘家园这样的低端市场;高端的印刷公司数量较少,他们的复制成本更多是花在购买或租借昂贵的真作上,往往只进行极少量的复制。

在北京某书画印刷公司,记者看到了这样的印刷流程:首先扫描原作,采集数据并输入电脑;随后把电脑显示的颜色转化成印刷色系,即黄、品红、青、黑四原色;最后就是控制墨滴分布,打印作品。在印刷过程中,颜色、位置都由电脑程序控制,非常细致,因此国画中难以模仿的新变效果也

可以完全实现。

“印刷品让我们惶惶不可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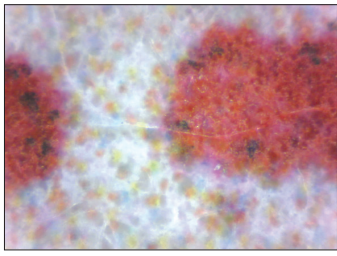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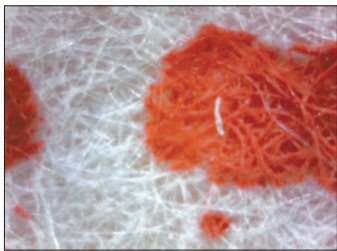
“印刷书画一旦猖獗,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藏家将把大量的资金投给肆无忌惮的骗子,而拍卖场上的假东西会越来越多。”郝惊雷说,这也是他决定撇开个人面子,走上法庭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几天,有人拿来一幅画说是花500万元买来的,结果我一打开发现是喷墨印刷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大恺说,喷墨印刷品已经做到一般人难以识别,只有专业画画的人能通过画的颜色、墨附着在纸上的感觉来区分。最近,他看了国内几家大拍卖公司的预展。“根据我的判断,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假画,情况很严重。”杜大恺有些愤慨。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喷墨印刷品的“厉害”,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请“高人”复制了一批书画印刷品,并与原作不记名地摆放到一起进行对比。原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主任胡锺看后感慨万千:“我在故宫看了30年的书画,也帮很多国家的博物馆藏品拍过照,尚且可以用眼睛辨别真伪。但说实话,如果不把两幅作品放在一起对比,确实很难鉴定出来。”

胡锺承认,故宫也有高仿作品,但这是由于很多名画拿出展览一次,就必须放回库内两年,需要高仿复制品来弥补这一缺憾。不过,故宫的书画复制品上一般会加上仿古印章作标记。“艺术品复制技术对研究和普及艺术的确起到重要作用,可一旦偏离正轨,就会产生非常坏的影响。”

山东美术馆馆长陈国力就险些把真作和复制品完全颠倒。“高仿真书画复制品的出现给美术馆的征集、保存、展示工作带来很大



困难。”陈馆长忧心忡忡地说,他们不仅要警惕购买的书画是印刷品,还要防止书画在保存和交流展出的过程中被人用印刷品掉包。“对经营美术馆的人而言,真是惶惶不可终日。”

针对新型的复制手法,陈国力盼望有新的鉴定手段与之抗衡。“以眼学为主的鉴定方法已经不适应这种高科技的造假方式,必须有高科技的鉴别手段来对付。”

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张忠义也提出,科技与传统结合是中国书画鉴定的必由之路。“科技手段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对材料进行定量分析,这是任何传统鉴定都无法做到的。”

此外,应用科技鉴定也可以防止人心不古。“如今,很多艺术家和专家在市场浪潮的冲击下思想发生了变质,故意把假的说成真的,所以要有一种科学的手段来防止这些人的违心鉴定。”胡锺说。

“更重要的是对外的中国书画印刷品有所鉴别和制约。”尹毅说,钻研中国书画印刷的不仅只有中国人,要知道这些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备从国外引进而来,国外也有专门研究印刷中国书画的机构。“中国有大量书画流失在海外,如果这些作品被印刷复制,以假乱真回流到国内艺术市场,后果不堪设想。”

高科技鉴定呼之欲出

2010年12月21日,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负责实施的国家科研项目“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通过专家验收,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成果便是对喷墨打印的高仿真书画的识别。

“把喷墨打印复制品放到先进的科技设备下,就会现出原形。”尹毅说,检测设备主要是从国外引进的光学仪器,然后针对

中国书画的特点对设备进行了相应改造,使其能对书画作品的纸绢、墨色、印泥进行物质成分和微观结构的分析。

“比如,原作色墨是手工调和后绘制在画面上的,在显微镜下观看局部色墨,其状态和人眼所见的书画色墨状态基本相似,而喷墨打印的复制品是将多种不同色相的颜料微喷在画面上,在显微镜下能看到红、黄、青、黑各色的微喷色点。”尹毅说,光学仪器就像“第三只眼”,可以窥探到书画作品的微观物质形态。目前,这项技术已经申请了国家专利。

但尹毅也表示,科技检测不是万能的。“这些科技检测的初步成果不能解决书画鉴定的所有问题,尤其是遇到后人用老纸、老墨等老材料制作的高仿品,科技鉴定就会备感困难。”如今,喷墨打印的花样也不断翻新。有的是直接打印,有的是半印半绘,即在打印后加以手工描绘,还有部分打印结合部分真迹。

“分色技术的改进也给鉴定带来新课题。”林治洪说,新的分色技术在原有的四原色基础上增加了色系,比如打印水墨画不用复合颜色,而是以炭黑为主,这在各种光源下看都非常接近原作。黑、灰、浅灰等色系的分层也使墨点更难以观察到。

“相比科技手段的加强,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鉴定机构,由国家赋予一定的职责。”胡锺建议,高价的拍卖品一定要经过鉴证和备案,才能进入拍卖程序。“要形成这样一个共识,没有经过鉴证就有可能是赝品。”

陈国力对此表示赞同。“美术馆的藏品有了检测认证和备案还不够,还需要社会的承认和法律的认可,要有公信力的单位来承担这项工作,这非常关键。”

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对整个艺术市场的治理规范。“欧洲早就有了技术鉴定,但并没有完全解决赝品问题,更多采取博物馆的备案制和艺术市场的规范建设。”如果艺术市场的监管体系没有健全,单独使用技术手段肯定会遇到困难,“搞不好,这些技术还会扰乱市场,有人可能会拿着假画去备案,并利用备案记录达到牟利的目的”。

“艺术市场发展既需要技术手段,也需要行业诚信的建立。”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娱乐演出艺术品市场管理处调研员李建伟说,目前艺术品管理条例正在制定之中,已经修改了多稿,就是希望通过完善宏观政策来提供制度保障。

书画司法鉴定处于真空地带

郝惊雷提出了司法鉴定的申请后,麻烦又来了。“在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机构中,没有一家是专业的书画鉴定机构。”郝惊雷说,由于技术原因,两家鉴定机构都退回了需要鉴定的书画。

“我国的司法鉴定体系目前尚未把书画鉴定纳入其中。”众成仁和律师集团事务所北京分所主任董一鸣表示,目前的书画鉴定机构非常多,但都没有司法鉴定资质。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这些鉴定机构出具的结论很难作为证据被采纳。

董一鸣分析,最大的原因是传统的鉴定经验没有形成统一标准。“把一幅画拿给不同的鉴定机构,往往会得出不同的鉴定结论。”董一鸣透露,司法部也曾考虑艺术品的鉴定问题,但由于传统鉴定存在缺陷,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唯一,没有形成标准。

近些年,随着艺术品市场的活跃,关于艺术品真假的纠纷也急剧增多。买家发现购买了赝品后,往往由于缺少相应的鉴定机制,其结果多是由法院对双方进行调和或被判败诉。自从买家苏

敏罗拍到吴冠中作品《池塘》的伪作对瀚海拍卖公司提起诉讼但终审败诉后,买家胜诉的几率就更小了。“拍卖公司可以拿出‘不保真’做挡箭牌。”郝惊雷说。

律师事务所的实际工作也证明了这一说法。“虽然关于艺术品真假的案件在增加,但我们现在代理的并不多,每年只有5起左右,很重要的原因是胜诉率太低了。”青年律师梁奇烽无奈地说。

“不过,越是这样,公众的维权意识越应该提高。”梁奇烽建议,买家在交易过程中可以让律师介入,做备案登记,起码能保证交易过程不可变更;其次,要注意合同中的措辞,“一些消费者看到‘保真’二字就买下,却没看到另外的条款中‘可能是真’的模糊词语。”一旦遇到纠纷,拍卖公司即可拿出这些条款来回避责任”。

“多数藏家买到假画,因投诉无门,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郝惊雷说,现在他感觉自己已是代表众多受害的收藏家群体与拍假行为进行较量。当然,有些买家不声张的原因是希望通过拍卖把假画再卖出去,这样不仅没有损失,还可能捞上一笔。

相关链接

针对高仿印刷书画,专家提供了相对简单的初步鉴别方法:

首先,一定要在亮光下鉴定真伪,最好在阳光下。由于多数印刷书画的墨色是由彩色颜料墨合成的,因此在阳光下容易看到泛出彩色,在灯光太暗的地方或者在暖调的射灯下则不容易看出。如今,多数拍卖会的预展和拍卖是在宾馆内进行,灯光昏暗,十分不利于鉴别。

其次,不要拿放大镜看,要用显微镜。喷墨打印机虽然高端,但有一处硬伤,那就是在放大的情况下可以看见墨点。由于墨滴非常细,用10倍放大镜根本看不出,用显微镜放大40至50倍,一般就能分辨出墨点。

最后,要留心印刷品的空白部分。如果出现墨点,极有可能是印版印刷,由于印版反复在纸张上印刷,会在书画的留白处留下墨迹,也就是专业上说的“脏版”。



工作人员正在用40倍的显微镜鉴别一幅书画手卷的真伪。 屈 茜 摄

民乐创新向何处

本报记者 王立元

如今,流行音乐、网络歌曲充斥着大街小巷,民乐的声音似乎已被淡忘。对许多“80后”“90后”来说,民乐这个概念甚至都有些陌生。在他们心目中,“中国风”的流行歌曲就是民乐。于是当某歌星演唱会一票难求时,一场民族音乐会的冷清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当各种音乐门类都在吸收中国元素,拥有最多中国元素的民乐却让大多数人对其的印象停留在《二泉映月》、《喜洋洋》、《步步高》这些传统作品时,民乐是否应该思考创新之路呢?

民乐呼唤新作品、好作品

随着人们审美习惯的变化,各种音乐形式都在不断发展创新。与此同时,很多民族乐团的常演曲目中80%还是《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步步高》……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无奈地说:“所有学校作曲专业的学生学的都是西方作曲理论。很多作曲家不了解民乐特色,也不了解民族乐队的特色,他们只是拿在学校学的西方作曲理论套用到民族管弦乐的写作上。”在他看来,全国各省市都有民族乐团,每个乐团都需要创新的作品,但是这类作品太少了,所以民乐团只能演《步步高》、《喜洋洋》。

对此,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李光华说:“作品太少是民乐发展的阻碍。最根本的原因是把民乐的创作作为一个任务来完

成,很多作曲家在一个时间段有可能只是为了一场演出而写些作品。”他说,很多优秀作品是作曲家在学生时代创作出来的,比如《梁祝》。但现在很多乐团的经理入总把眼光局限在有名气的作曲家身上,而名作曲家往往同时接很多邀请,可能会把创作当活儿做了,好作品就很难出现。

李滨扬是近年来各民族乐团委约最多的作曲家之一,他为中心民族乐团写《天下黄河》时,已经考虑到受众面的问题。“当时中央民族乐团的要求是让我写一段能达到《黄河大合唱》那样效果的旋律,既有惊心动魄的气势,又能表现出一个民族的气质,我就按照他们的要求尽力去做了。”他认为,从2005年起,很多作曲家开始回归到民乐的市场性这一层面,“在此之前,许多作曲家更注重技术探索,也不在乎旋律是不是很优美,一般老百姓听听不懂。”李滨扬说。

“前几年,人们都说民乐陷入低谷,中央民族乐团的演出市场也非常不好,但我不认同民乐不被市场看好的观点。我认为,中国的民乐市场很大。因为民乐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各种



“女子十二乐坊”红火一时,也引来不少争议。

民族乐器像二胡、笛子、唢呐等都是老百姓最熟悉的乐器。”席强说,“为什么前些年民乐没有市场?我认为这是给观众听的曲目在结构上有问题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审美观,在保留经典曲目的基础上还需要创作更有当代文化代表性的艺术作品。”

创新必须是艺术上的创新

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民乐团团长周维眼中,音乐发展的根本在于创新。“贝多芬和刘天华分别是交响乐和民乐的代表人

物。贝多芬首次采用平行五度、十三和弦作曲,刘天华第一个借鉴西洋乐队的和弦,用进行曲给二胡写《光明行》。我们讲继承传统首先要知道传统的内涵。”在他看来,当代人对音乐欣赏的需求已经不能被传统曲目满足,现在即使弹《春江花月夜》也不能按老版本去弹,要加进一些时尚的元素。“创新必须有实际上的艺术创新。有些创新只是形式创新,其旋律不吸引人,或者乐曲的内涵不行。”周维说,“现在有民乐交响化的趋势,有些民族乐团一味搞人海战,动辄是二三十分钟的大型

交响乐,结果是作曲家创作累、演奏人员演得累、观众听着也累。”

2003年走红的“女子十二乐坊”以站立演奏和在民乐中融入大量现代音乐元素而让大家对民乐有了全新的感受,走出了所谓的民乐新流行路线,以其为代表的民乐民乐也在那段时间内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民族音乐的关注。好景不长,2005年,“女子十二乐坊”开始走下坡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说起新民乐这种形式,席强并不认同:“我认为只能叫多种组合的民族器乐演奏,这种民乐表现形式是用流行音乐的创作技法在创作,而不是像传统民乐如《十面埋伏》那样,用有中国特色的表演结构、曲体手法和音乐语汇。”

“新民乐只是民乐的几个‘菜系’之一,是市场行为。步‘女子十二乐坊’后尘的那些乐队组合相继解散,也说明他们不能按老民乐发展的方向。”李光华说,“我们现在面临着怎样在民乐创新的同时突出民族性的问题。从表面看,民乐发展挺繁荣,民乐团很多、演出也不少,但从长远看,有些选择让我们走远了。比如有些作品完全用现代手法创作,但民

乐队演奏一遍就没人听了。为什么谭盾的《火祭》,作曲手法也很现代,却透着浓浓的民族味?刘文金的作曲手法也不落后,却能凸显民族风格?这值得我们思考。”

与新民乐流行化、通俗化相对的另一方面,还有某些作曲家刻意追求晦涩难懂。“民乐的特点是旋律优美,而不是玩技巧、玩深沉。”席强说。

周维对此的看法是:“为什么过去一些老作曲家的作品到现在还在被传诵?因为他们那一代人有非常丰富的生活阅历。只有作曲家自己具备了深刻的东西,作品里才能有这种深刻。有些电影非常受老百姓欢迎,就是因为演员深入体验了生活,比如演犯人就要和犯人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民乐意识开始觉醒

将来是否会有更多的人重新喜欢上民乐?“关键看我们怎么做。老百姓不管什么形式,只要贴近他们就会接受。民乐的优美旋律不能丢,把当代人富于动感和表演性的特色赋予其中肯定也是多姿多彩的。这还需要一个过程,不过我们应该有信心。据不

完全统计,现在二胡的学习者已经有200多万人。”周维说。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中国民乐开始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国外的很多作曲家也在把中国元素加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李滨扬介绍,“一个月以前,一个美国的大学教授听了我学生作的一个曲子,非常激动,说 he 也在写中国的民乐,但是一直找不到感觉,一定要把曲谱带走。”

“现在学校的创作氛围比较好。”李光华说,“学生们演奏能力也在提高,作曲家发挥的空间更大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除了设置器乐、作品分析和声、曲调的课程,还开设了民歌、戏曲音乐、说唱、民间音乐的课程。“我们每年都会出去采风,老师也鼓励学生创作民乐,某个学生的想法有意思,大家都去思考,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中央民族乐团也开始深化内部机制改革,以做剧目的形式做委约创作。“一般委约的新作品能够成活30%就相当高了,我们现在能达到80%,节省了资金、盘活了市场、带动了民乐演出市场。我们还把《菊花台》等适合民乐改编的流行歌曲纳入到民族音乐会中来,改编成二胡、大提琴与乐队。到学校演出时一报演出曲目,叫喊声爆棚。可想而知学生喜欢的是什么了。我们要把学生吸引过来,要有一个交流的平台,把喜闻乐见的流行歌曲嫁接到民族音乐上,让他们从熟悉的旋律中体会到民乐的高雅。”席强说。